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尋求西方援助的嘗試： 評宋子文1933年的歐美之行

鄭會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長期以來學術界沿襲一種觀點，認為南京政府成立初期由於吸取了前政府的教訓，「對於外債，力主慎重，不肯輕於起借」。<sup>1</sup> 即使談到舉債，也往往只是提及美麥借款和棉麥借款。<sup>2</sup> 但實際情況並非完全如此。事實上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一直沒有放棄爭取外援的努力，其中1933年宋子文的歐美之行就是國民政府尋求西方援助的一次重要嘗試。儘管由於種種原因(主要是日本的破壞和干擾)，宋子文此行並未完全取得預期的效果，但這一行動的本身卻明確地向歐美各國表明了中國迫切需要外援的願望。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也採取了各種措施減少吸引外資的障礙，終於在抗戰爆發前一、二年出現了外國對華投資的高潮。

—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為了吸引外國財團對華投資，除了設立整理內外債委員會、允諾清理前政府遺留下來的債項以提高債信外，還相應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引進外資的政策。由於前清及北京政府濫借外債以致債信低落、抵押殆盡，國民政府此時著重強調的是引進外資必須遵循「平等互惠」、「尊重主權」之原則。

1928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對於經濟建設發表宣言，以為「必須首謀開發社會經濟所賴以為發動之基本工業」，「惟以目前社會之貧乏，科學之落後，驟欲舉事而求速效，勢不可能。故必依平等互惠而不損主權之原則，盡量吸收外資，借用專門人材，庶幾事半而功倍」。<sup>3</sup> 嗣後不久，孫科於就任鐵道部部長發表施政方針時也指出：「國內

<sup>1</sup>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調查室(編)：《中國內外債詳編》(北平：中國聯合準備銀行，1940年)，頁76。

<sup>2</sup>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賈德懷：《民國財政簡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上冊，頁336；李立俠：《中國外債之檢討》，《東方雜誌》第34卷第14期(1937年8月)，頁17-26。

<sup>3</sup> 轉引自張其昀：《中華民國史綱》(臺北：中國文化事業出版會，1954年)，第三冊，頁197-98。

集資，河清難俟；生民痛苦，長夜漫漫。」因而主張「在平等互惠條件下盡量吸用國際資本」。<sup>4</sup>

1929年3月，行政院第17次會議根據孫中山先生的計劃實施方案，確定了利用外資的原則，並經中央政治會議第179次會議討論決議通過，即：

甲、在不損害主權範圍內，除普通借款外，政府亦可採用與洋商合資經營各種建設事業，並以公司名義經營之，但須有相當之限制，其限制原則另定之。

乙、政府投資之公司或華商經營之公司，得許洋商投資或合資共同經營之，但須有左列限制辦法：

- 一、華股須佔全部股份百分之五十一以上；
- 二、華董事須佔多數；
- 三、董事長及總經理等職應由華人充任之；
- 四、商人合資應受中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之限制。<sup>5</sup>

1930年3月，國民黨三屆三中全會通過《最近建設方針》，指出「鐵道、水利、造船、製鐵、煉鋼等偉大建設之事業，依照總理節制資本之義，宜由國家經營之。如國庫不足，於不妨礙國家主權之範圍內借用外資，乃為必要」。於是規定「煤鐵油銅礦之未開發者，均歸國家經營，政府得照總理所定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在一定範圍內，准外人投資或合資創辦」；「中國之特種工業，在總理實業計劃內所規定應新創設之廠，均由政府計劃辦理，並得借用外資及人材」；「政府應在兩年之內籌設：一、大規模之製鐵煉鋼工廠，二、造船廠，三、電機製造廠，得借外資興辦」。<sup>6</sup> 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亦將利用外資的方式定為下列三種：（一）合資方式。由政府與外商合資，採用公司式組織，興辦政府建設事業；（二）特許方式。政府特許外人在華經營建設事業；（三）借貸方式。政府向外商借貸興辦事業。並對上述三種方式加以種種限制和規定。<sup>7</sup> 很明顯，國民政府此時的建國方針就是想通過借用外資，重點建設由國家經營、並以鐵路、水利、能源及礦產為中心的重工業，其最終目的則是為建立一個以國家資本為主要成分的經濟體系而奠定基礎。

儘管國民政府為了吸引外資而相應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其收效卻極為有限。吸引外資在實際工作中存在著許多困難，其中不僅受到國內政治、經濟局勢的影響，而且也同國際局勢、特別是同當時錯綜複雜的遠東關係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

<sup>4</sup> 上海《民國日報》，1928年11月23日，第2張第2版。

<sup>5</sup> 〈行政院為利用外資案致工商部部長訓令〉（1929年3月26日），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以下簡稱《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22-23。

<sup>6</sup> 上海《民國日報》，1930年3月4日，第1張第3版。

<sup>7</sup> 〈行政院抄發關於政府利用外資案及投資方式致工商部密令〉（1930年4月10日），載《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五）」，頁123-26。

首先從國內局勢來看，當時財政枯竭的情形可以用四句話來形容，即負債累累，抵押殆盡，債信低落，舉借無門。

從清末到民國初年，由於財政支絀，入不敷支，歷屆中央政府幾乎都依靠舉債來維持統治。據統計，1853-1893年清政府共舉借外債45,922,969庫平兩，1894-1911年舉借外債1,203,825,453庫平兩，1912-1927年北京政府中央及地方共借外債387筆，債額計銀圓1,279,619,514元；同期南京臨時政府、護國軍政府及南方獨立各省亦先後舉借外債80筆，債額計銀元57,377,276元。<sup>8</sup> 除此之外，尚有為數高達四億五千萬兩的庚子賠款。

由於各地截留，財政支出日益增大，政府不得不剝肉補瘡，借新債還舊債。除了幾筆有確實擔保的債務和部分鐵路借款尚能按期償付外，許多無確實擔保的債務積欠日久，不少債務利息早已超過本金，以致債信低落，日甚一日。截至1925年年底，財政部經管的有確實擔保外債積欠純本計銀圓413,962,019.79元，庚子賠款積欠純本計銀圓396,518,786.52元，無確實擔保外債積欠本息計銀圓354,018,611.50元。<sup>9</sup> 交通部經管的外債積欠本息為銀圓561,967,765.37元。<sup>10</sup> 同時，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為了舉債，不得不將關稅、鹽稅、釐金、貨物稅、煙酒稅、鐵路收入等等充作抵押。到最後，舉凡賴以維持財政的各種稅收幾乎全部充作擔保，已經難以舉借新債了。

國民政府成立後，為了盡快取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對外公開宣佈有確實擔保債務將依慣例按期償付，對無確實擔保債務亦允諾設法清理，並組織整理內外債委員會，召集各債權國代表會議商討整理債務辦法，但直至1934年，有關部門對於如何償付積欠外債（特別是無確實擔保債務）並無具體辦法；而且此時國民政府又將新增關稅收入作為發行內債的擔保，從而引起外國債權人的抗議。債信既無法恢復，當然也就很難期望吸引新的外資了。1929年7月14日，美國首席代表拉蒙特(Thomas Lamont)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國際商會上聲稱：「中國現在的國際信用很低，除非他們對重建工作有詳細確切的計劃，否則是不可能向紐約市場借款，我敢說在歐洲也是一樣。」<sup>11</sup> 拉蒙特的這番話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一般歐美國家政府和金融界對中國投資的態度。

從國際局勢上看，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正值空前未有的經濟危機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際，這也是國民政府尋求外援的努力遭到挫折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sup>8</sup> 徐義生(編)：《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1，90，240。

<sup>9</sup> 北洋政府財政部檔案：一〇二七(2)/1611。本文所引檔案除注明外，均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sup>10</sup> 北洋政府財政部檔案：一〇二七(2)/1574。

<sup>11</sup> 轉引自張貴永：《詹森與中美關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86。

1929–1933年，世界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爆發了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持續時間之長、波及範圍之廣、造成危害之大均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伴隨經濟危機而來的是整個西方國家的信用危機，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以及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由於無力按期償付所負的國際債務，紛紛單方面宣佈停付或緩付拖欠的外債；而債權國一來因經濟危機導致本身的資金短缺，更重要的則是恐於國際間普遍存在著的賴債行爲，視投資、借債爲畏途，因而拒絕向國外提供貸款，致使國際借貸市場的活動幾乎陷於停頓，資本輸出亦隨之大幅度下跌。據統計，美國的外國有價證券發行額從1928年的十三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猛跌到1933年的一百六十萬美元，英國（不包括對殖民地的貸款）也從1928年的五千七百萬英鎊下降到1933年的八百萬英鎊。<sup>12</sup>

在此期間，各國政府對於對華借款均加以種種限制，例如美國國會1934年8月通過的「證券匯兌法案」（Securities Exchange Act）中關於銀行投資的規定即阻止了大部分感興趣的美國銀行團參加國際銀行團對中國的借款。<sup>13</sup> 所有這一切都對中國政府尋求西方借款造成了障礙。

除此之外，新四國銀行團的存在亦阻止了列強的對華借款。

國際銀行團是本世紀初列強對華大肆進行資本輸出的產物，它成立的目的在於通過建立一個機構來協調各國在對華借款上出現的矛盾，從而進一步壟斷國際對華借款。儘管其間這一組織的成員經歷了不少演變（先三國，後四國，再六國，又五國，最後又變成四國），但在控制和壟斷對華借款這個原則上則從未有過甚麼改變。

1918年歐戰結束後，沙俄被推翻，德國成了戰敗國，國際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先退出銀行團的美國首先向英、法、日三國提議成立新四國銀行團，重新控制對華借款。儘管新銀行團成立後並未得到歷屆中國政府的承認，亦未經手對華借過任何款項，但由於新銀行團的種種規定，<sup>14</sup> 嗣後中國政府便很難向各銀團成員國單獨借款，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抗戰爆發前夕才發生變化。

由於上述情形，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基本上沒有舉借過甚麼外債，外國對華投資亦爲

<sup>12</sup> 引自吳首天：〈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國民黨政府外債政策之研究〉，《史學月刊》1984年第6期（1984年11月），頁77。

<sup>13</sup>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86.

<sup>14</sup> 譬如新銀行團商議成立時的決議就明文規定，「除已爲各國既定之權利外，凡中國之實業與鐵路借款，無論現在或將來，其優先權概爲本團承受」（第二條）；「銀團外資本家已經訂有契約或優先權者，務設法使其讓歸本團」（第三條）。有關新銀行團成立的情形，詳見〈法、日、英、美駐華公使抄集四國新銀團文件致外交部照會〉（1920年9月28日），北洋政府財政部檔案：一〇二七(2)/1466。

數甚少。<sup>15</sup> 這一時期南京政府爲了應付日益增加的財政支出，除了千方百計增加各種稅收之外，還須向國內金融界發行公債和庫券。<sup>16</sup>

然而到了1933年，這種情況卻發生了變化，導致向國外尋求借款的需要日益迫切。首先，東北的淪陷使得中國的工業失去了巨大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場，加上日僞強行奪取東北的關、鹽稅收，致使國民政府的國際收支日形艱窘。<sup>17</sup> 其次，此時世界性經濟危機已波及到中國，歐美各國爲了轉嫁危機，競相向中國傾銷本國的過剩產品，使得中國先天不足的民族工業更形凋敝；<sup>18</sup> 而1931年的長江大水，又導致內地農村經濟的破產。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連年內戰並發動剿共戰爭，以致軍費開支浩繁，入不敷出，赤字嚴重。此時僅靠發行內債已無濟於事，而且連年發行內債也已經超過了國內銀行界的承受能力，<sup>19</sup> 因此國民政府不得不將目光轉向西方。宋子文1933年歐美之行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進行的。

## 二

三十年代初期，經濟危機籠罩全球，各國之間相互樹立關稅堡壘，防止別國商品傾銷。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爲了解決各國之間的關稅以及貨幣等問題，決定於1933年

<sup>15</sup> 鄭會欣〈戰前國民政府舉借外債的數額及其特點〉(載《民國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第一輯，1994年)之附錄「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各部門舉借外債一覽表」統計了1927-1937年歷年舉債數額(頁154-72)，可供參考。

<sup>16</sup> 據統計，國民政府自1927年5月至1931年年底共發行內債和庫券二十八筆，發行額高達十億餘元。詳見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北京：財政經濟出版社，1955年)，頁370-73。

<sup>17</sup>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曾撰有〈日僞強佔東北海關及其對中國財政的影響〉一文提交第三屆中國海關史國際學術討論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1995年5月)，論文集即將由該系出版。

<sup>18</sup> 世界經濟危機一直到1931年才逐步影響到中國，這是因爲當時中國是一個銀本位的國家，1929-1931年，由於銀價不斷下跌，在貿易上反倒抵消了經濟危機的不利影響。直到1931年之後，中國才開始感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其中最明顯的表現便是對外貿易的下跌和入超額的大幅上升。據統計，1930-1933年的四年間入超額高達196,584萬海關兩，平均每年入超49,146萬海關兩。1932年是入超最多的一年，達到55,626萬海關兩，爲同年度進口的2.13倍。入超主要來自美、英等西方國家的商品傾銷，其間美國對華輸入爲從中國輸出的4.49倍，英國爲3.17倍。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編)：《上海對外貿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上冊，頁185。

<sup>19</sup> 1932年2月財政部與持券人達成協議，對公債與庫券進行整理，降低利率，延長償付期，實際上就是債信跌落的一個標誌。據當時的報紙透露，政府曾作過「四年之內不發內債」的口頭允諾。見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頁20-21。

6月在倫敦召開世界經濟會議(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剛剛就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趁此機會也向英、法、德、中、日等十一國首腦發出邀請，希望各國派代表於出席世界經濟會議之前，先行訪問華府，分別討論雙邊經濟關係。

中國政府在收到邀請之後，認為這是向國際間尋求援助的極好機會，遂立即委派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宋子文率團出席世界經濟會議，並應羅斯福之邀先期訪問美國。

宋子文自1928年初接長財政部，開始掌管全國的財政金融。多年來的經驗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國家財政的艱窘狀況僅靠增加稅收、發行公債已無濟於事，從而將目光轉移到吸引外資的方向上來。早在1932年6月，宋子文就向英國駐華使館代辦伊格蘭姆(Ingram)表示，他打算向國際市場上借入相當數額的資金，用以開發經濟建設和國防上所急需的資源。<sup>20</sup> 特別是「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爆發後，而對著日本軍國主義日趨明顯的侵華野心，宋子文更加堅定了依靠英美、孤立日本的信念，成為國民政府上層中親英美派的代表人物。因此這次出訪不論對國民政府或是對宋子文本人來講，意義均十分重大：宋子文不僅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出訪歐美職位最高的官員，他本人也是擔任公職後的首次出訪。對宋子文來講，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次出訪可以利用與世界各大國首腦會晤之際，實現他早已萌生的「聯合歐美、抵禦日本」的策略。

1933年4月18日，宋子文一行由上海乘船前往美國，開始了他為期四個多月的官式訪問，其間他相繼訪問了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等歐美重要工業國家。宋子文此次出訪名義上是出席倫敦的世界經濟會議，並於7月22日與世界上主要用銀國及產銀國簽定了「白銀協定」，<sup>21</sup> 但其真正的使命卻是尋求歐美各國(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財政經濟援助以及國際聯盟的技術合作，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一) 與美國洽談並簽定棉麥借款

宋子文一行5月6日抵達華盛頓後即開始與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國務院遠東司司長霍恩貝克(Stanley K. Hornbeck)、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Key Pittman)等人相繼舉行多次會談，雙方除了對遠東國際關係以及關稅、貨幣等問題(其中尤以白銀問題為重點)進行了討論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5月29日宋子文與美國財政復興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簽署了一筆總額為5,000萬

<sup>20</sup> Ingram to Simon (June 20, 1932),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2nd Series, Vol. 10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4), pp. 512-13.

<sup>21</sup> 關於世界經濟會議及倫敦白銀協定之詳情可參閱宋子文《金融經濟會議報告》(1933年10月)，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檔案，政001/73(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藏)及羅素(著)、鄭會欣(譯)：《院外集團與美國東亞政策——30年代美國白銀集團的活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二章，頁18-39。

美元的信貸合同。由於這筆信貸並非現金交易，而是由美國將其所產價值5,000萬美元的棉花和小麥交由中國政府銷售，故稱為棉麥借款(Wheat & Cotton Loan)。關於棉麥借款的詳情筆者曾有專文論述，<sup>22</sup> 這裏不再重複。

## (二) 計劃成立國際諮詢委員會

前面曾經提及，1920年成立的新四國銀行團不但沒有向中國提供援助，反而還阻礙了各國單獨對華貸款。因此宋子文此次出訪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向歐美各國政府及金融界遊說成立一個國際諮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宋子文簽定了棉麥借款合同後即離開美國，於6月4日抵達倫敦。在參加世界經濟會議之前及會議期間，他還頻繁地與倫敦的一些金融家會談，目的是想獲得借款和信貸，以便使中國能夠購買棉紡機器、鐵路設備、船隻和其他設備，同時他還正式提出要「組織一個類似四國銀行團的國際合作機構，目的是為了排除日本」。<sup>23</sup>

按照宋子文的計劃，這個委員會應有一億元(相當於1,500萬英鎊)資本，其中一半由中國承擔，另一半則希望從英國或歐洲募集。宋子文強調，中國十分重視與英國商業和財政上的交往，因而迫切希望保持和加強與英國及歐洲的聯繫。<sup>24</sup> 至於委員會的成員則應由富有聲望的中外財政和金融專家組成，外國專家必須由中國人來指定，大體上英國和美國各佔三名，法國和意大利各佔一名，但不包括日本人在內。作為這個方案的額外條款，宋子文希望該委員會最終能取代於1920年成立的國際銀行團的地位，從而可以對中國政府正在進行的復興計劃予以金融方面的援助。<sup>25</sup> 這樣中國既可以在工業與鐵路建設方面獲得西方的貸款，在政治上又可以建立一個不包括日本在內的新組織，正符合宋子文「聯合歐美、抵禦日本」的構想。

接著宋子文又到了巴黎，在向法國當局試探有無可能貸款的同時，也同樣提出成立「諮詢委員會」的建議。按照他的解釋，這個委員會將由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和中國的專家組成，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意見，並希望由法國人蒙內(Jean Monnet)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sup>26</sup>

世界經濟會議閉幕之後，宋子文又於7月下旬訪問了柏林，其間相繼會見了德國外交部代表米歇爾遜(Michelsen)和西門子公司的代表萊斯(Reyss)及徐莫凱

<sup>22</sup> 詳見鄭會欣：〈1933年的中美棉麥借款〉，《歷史研究》1988年第5期(1988年10月)，頁128-37。

<sup>23</sup> Stephen Lyon Endicott, *Diplomacy and Enterprise: 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75), p. 35.

<sup>24</sup> Simon to Lampson (July 4, 1933),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2nd Series, Vol. 20, pp. 24-25.

<sup>25</sup>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p. 63.

<sup>26</sup> Endicott, *Diplomacy and Enterprise*, p. 35.

(Schmulky)。除了提及邀請德國參與中國工業和通訊事業的投資之外，宋子文也同樣提出成立「諮詢委員會」的計劃。對此德國方面原則上表示同意，德國國家銀行副總裁德萊士(Dreyse)並建議由國家銀行副經理謝普爾(Schippel)作為德國方面的代表參加這個委員會。<sup>27</sup>

在宋子文的遊說之下，國際銀行團中最主要的成員美國的拉蒙特和英國的艾迪斯爵士(Sir Charles Addis)都有些心動，表示願意考慮這個計劃，他們相信通過秘密途徑能夠解決中國的債務問題。甚至原本強烈反對向中國提供借款的美國國務院遠東司的官員也都同意這個設想。<sup>28</sup>

### (三) 尋求國聯技術合作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宋子文訪問歐洲的另一個任務則是尋求國際聯盟技術上的支持和合作。<sup>29</sup>

中國是國際聯盟的創始國之一，並曾經一度擔任過國聯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1925-1928)。在北京政府時期，國聯即有意同中國政府進行有關衛生防疫方面的合作，但因當時中國內戰頻仍，政局混亂，中央政府自顧不暇，合作之事便不了了之。<sup>30</sup>

國民政府成立後，國聯先後派遣國際勞工局局長湯姆斯(Albert Thomas)、副秘書長愛文諾(Joseph A. C. Avenol)訪問中國。當時雖未正式談及具體合作計劃，但愛文諾應允「願將中國之政治精神與文明建設介紹予國聯各國」，並表示中國若有需要，國聯當協助經濟建設，盡量使其漸上軌道。<sup>31</sup> 在這之後，國聯又兩次派遣衛生部部長拉希曼(Ludwig Rajchman)來華考察衛生合作計劃。為了進一步加強雙方合作，在拉希曼的推薦之下，1931年1月7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聯名邀請國際聯盟財政經濟部部長沙爾特(Arthur Salter)和交通運輸部部長哈斯(Robert Haas)來華。<sup>32</sup> 這三位國聯技術部門首腦的來訪，為中國與國聯之間奠定了技術合作的基礎。

在這之後不久，宋子文又以行政院副院長的名義致電國聯秘書長，說明中國政府已決定成立全國經濟委員會，並正式要求國聯派出顧問，協助該會的組織、設計及開辦各項建設計劃，包括幫助中國物色顧問、訓練專門人材、改進中國的教育制度等，電文並

<sup>27</sup> 郭恆鈺等(主編)：《德國外交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125-26。

<sup>28</sup>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Far Eastern Crises of 1933-1938*, p. 91.

<sup>29</sup> 關於這一時期國聯與國民政府合作的情形可參閱張力：〈一九三〇年代中國與國聯的技術合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1986年)，下冊，頁281-314。

<sup>30</sup> 吳秀峰(編)：《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油印本，1933年12月)，載全國經濟委員會檔案：四四(2)/240。吳秀峰曾擔任國際聯盟衛生部秘書，多次陪同拉希曼訪問中國。

<sup>31</sup> 《申報》，1929年3月20日，第7版。

<sup>32</sup> 吳秀峰：《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

強調：「如遇必須多數國家國際上之合作及聯絡政策，始可排除中國發展上之阻礙時，中國可自動提請國聯為相當合作。」<sup>33</sup>

1931年5月18至23日召開的第63屆國聯行政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國政府的這一請求，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在動議中雖然表示日本「對於南京中央政府之努力十分同情，準備予中國以充分的貢獻」，但他認為這個計劃應為純粹技術性的，不含有任何政治背景，並深信國聯日後將會邀請日本參加。<sup>34</sup>

然而幾個月之後，日本相繼發動了「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其對國聯予中國技術合作的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由於國聯面對日本的入侵只能做到口頭上的譴責，無法對侵略者加以制裁，故而逐漸轉為加強對華的經濟合作，認為只要中國能堅持與國聯的合作，藉以增強國力，即可逐漸消除危害中國的因素，而這些則正是日本所極不願意見到的。

因此，宋子文1933年訪問歐洲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繼續尋求國聯的支持。6月28日，宋子文代表中國政府致函國聯秘書長，函中首先回顧了幾年來中國與國聯的技術合作情況，接著列舉了今後的規劃，最重要的則是要求國聯委派技術代表常駐中國，以保證合作的繼續進行。<sup>35</sup>

7月3日，國聯第74次行政會議討論了中國的請求，並擬於國聯內組織一個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顧維鈞在會前提出該委員會應由國聯的四個常任理事國、四個非常任理事國以及國聯行政院主席組成，中國代表必須在內，同時也希望美國參加。同日下午的會議通過了該委員會的人選，即由國聯行政院主席和中國、英國、法國、德國、捷克、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八國代表組成，並建議必要時可邀請其他國家委派代表參加工作，<sup>36</sup> 這實際上是為以後美國的加入掃除障礙。

7月18日，國聯這個新成立的委員會於巴黎召開第一次會議，宋子文、顧維鈞代表中國政府參加會議，美國雖然不是國聯成員，但也推派代表列席討論。會議一致通過委派拉希曼為國聯駐華技術代表，充任「中國經濟委員會與國聯主管機關關於技術合作的聯絡員」，並對其職務作了具體規定。<sup>37</sup> 至此，宋子文尋求國聯技術合作的目的總算有了一個結果。

<sup>33</sup> 宋子文致國聯秘書長電(1931年4月25日)，轉引自吳秀峰《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

<sup>34</sup> 吳秀峰：《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

<sup>35</sup> 民國二十三年《中國外交年鑒》(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頁172；又見《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二冊，頁251。

<sup>36</sup> 《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冊，頁253-54。

<sup>37</sup> 吳秀峰：《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

### 三

日本最初對宋子文在美國的活動並不十分注意，以為這只不過是一般的官式訪問，甚至對中美兩國簽定的棉麥借款也不大理會。在棉麥借款協議正式公佈的十多天之後，日本外務省亞洲司第一科還認為，棉麥借款與其說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擴張的一個例子，倒不如說是美國為解救本國因大蕭條而受到嚴重打擊的措施；對中國來說，這筆借款的作用也僅僅是暫時「注射了一針興奮劑」，而且看來美國和其他國家也不會繼續向中國提供類似的貸款。因此對於日本來說，最好還是不要急於公開表示反對。<sup>38</sup>

然而，當日本政府了解到宋子文在美國和歐洲各國的活動並不只限於一筆借款，而是企圖全面尋求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援助，特別是獲悉宋子文欲聯合英、美、法等國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來取代四國銀行團的地位，並要求國聯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推動和援助中國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時，日本的態度就由暫時的克制改為公開的干涉和破壞了。

7月17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向駐美大使出淵、駐英大使松平、駐法大使長岡、駐德大使永井及國際聯盟帝國事務局代理局長伊藤等發出訓電，令其立即分別與所在國交涉，要求各國不得「以購買武器或財政的援助為目的」，向中國提供借款。若各國不予理睬，「則將來中國藉此關係國之經濟的援助，而敢為反滿抗日方策之際，我方則有繼續行使前於滿洲、上海兩事變曾經表示毅然的自衛行動之意向。關於為此所引起日華紛爭之再發，其責任應由援助國分擔」。<sup>39</sup> 7月28日，內田外相在致駐華公使有吉明的電報中則更明確指出：「我方歷來主張，日支問題應由兩國間直接交涉處理，決不允許第三國介入。而且，如果要增加對華援助的話，一定要排擠其他各國，而由日本獨自進行，或者至少應在日本同意之後，諸國方能協商進行。這是希望支那安定、並對保持遠東和平負有重任的帝國理應採取的不可動搖之態度。」<sup>40</sup> 不久，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即奉命向美國國務卿表示，美國向中國「出售棉花和小麥可能會嚴重影響到日本」，因此今後美國「在採取任何將要或有可能影響日本利益的步驟之前，必須先同日本進行協商」。<sup>41</sup>

<sup>38</sup> 日本外務省檔案：〈亞洲事務局第一科擬定之備忘錄〉（1933年6月15日），轉引自入江昭等（編）：《巨大的轉變：美國與東亞，1931-1949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83-84。

<sup>39</sup> 惜微：〈日本朝野對於我國棉麥借款等措施之態度〉，《外交月報》第3卷第5期（1933年11月15日），頁185。

<sup>40</sup> 轉引自伊豫谷登士翁《アメリカの對華棉麥借款と日本》，載小野一一郎、吉田肅（編）：《兩大戰間期のアツアと日本》（東京：大月書店，1979年），頁109-10。

<sup>41</sup>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3, p. 508.

與此同時，日本也對宋子文提議成立諮詢委員會的計劃進行破壞。在四國銀行團中日本代表野原大輔的遊說之下，美國和英國金融界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美國摩根公司的拉蒙特首先拒絕參加諮詢委員會，因為他的公司在日本有大量生意，所以不能不考慮日本的反對立場。<sup>42</sup> 野原向英國匯豐銀行的艾迪斯爵士強調，考慮到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和影響，不能成立這樣的組織；退一步說，即使這個委員會成立了也不會具有甚麼權威性和有效性，相反只能導致中日之間關係緊張。<sup>43</sup> 英國方面不願意因此而得罪日本，所以也拒絕參加諮詢委員會；甚至當匯豐銀行有意對中國貸款時，英國國家銀行總裁立即加以反對，他認為這樣做會失掉英國在華的重要地位，也會喪失以後向中國貸款的權利。<sup>44</sup> 由於英國和美國不合作，這個計劃很快便夭折了。

國聯援助中國的計劃同樣也引起日本的猜忌。因為在日本人眼中，國聯派駐中國的代表拉希曼是個著名的反日分子，「九·一八」事變後他曾積極促成中國政府就日本侵略東北向國聯提出交涉，而且國聯新成立的這個委員會竟然沒有日本的代表（儘管此時日本已經退出了國聯），也使得日本政府極為不滿。為此日本外務省曾致電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力謀阻止拉希曼來華，但未能奏效。<sup>45</sup> 爾後又發表聲明，認為國聯此種援助「殊有助長以夷制夷之嫌」，並警告若日後合作出現任何政治活動跡象，日本「自有採自衛手段之準備」。<sup>46</sup> 以後的事實也說明，日本政府確實對此加以種種破壞和干擾，其中1934年4月17日所謂「天羽聲明」就是日本反對國聯援助中國的最明顯事例。

#### 四

1933年8月12日，宋子文由美國的西雅圖乘船回國，途中經過日本的神戶和橫濱，但他仍同數月前出國時一樣，既未離船上岸，也未接受日本記者的採訪。8月29日，宋子文一行抵達上海，受到了英雄式的歡迎，接著他又連續不斷地出席上海、南京等地各界為他舉辦的歡迎會。此次出訪歷時四個多月，其間所見所聞對宋子文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曾深有感慨地說：「子文外感於世界經濟文化國防，凡百施政之突飛猛進，內愴於近年我國天災人禍之紛至沓來，認為立國之道，惟在以國民經濟為中心，而以國家全力維護與發展之。」<sup>47</sup> 此時的宋子文可謂躊躇滿志，意氣風發，決心利用這次出訪歸來的影響一展手腳，實現他「聯合歐美、抵禦日本」的抱負。

<sup>42</sup>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p. 64.

<sup>43</sup>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3, Vol. 3, pp. 505-6.

<sup>44</sup> Endicott, *Diplomacy and Enterprise*, pp. 36-37.

<sup>45</sup> 芸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10卷第30期（1933年7月31日），頁6。

<sup>46</sup> 蔣廷黻：《東京的警告》，《獨立評論》第61期（1933年7月30日），頁3-4。

<sup>47</sup> 芸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10卷第35期（1933年9月4日），頁2-3。

在宋子文的積極活動下，已籌備兩年多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終於正式成立。9月23日，國民政府修訂該會的組織條例，規定全國經濟委員會直隸於國民政府，其職掌為負責設計審定國家經濟建設或發展計劃，核定經費並予監督指導，對於特定的經濟建設或發展計劃則負有直接實施之權。同時委任汪精衛、孫科、宋子文三人為常務委員。10月4日，全國經濟委員會宣告成立。<sup>48</sup>

然而，此時中國國內的情況卻出現了變化。在宋子文出訪期間，中日兩國簽定了塘沽協定，國民政府內親日派的勢力不斷上升並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因此必然會與以宋子文為首的英美派在政見上產生分歧。在這種情形之下，宋子文還未來得及貫徹他那一整套計劃時，10月28日即黯然辭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的職務。儘管宋辭職的因素有很多，但他外交與財政方面的主見與當政者發生牴牾確是導致他下臺的一個重要原因。<sup>49</sup>

與此同時，宋子文歐美之行所取得的成果也遭到嚴重挫折。

就在宋子文回國後不久，根據棉麥借款的協議，第一批美棉運抵上海。然而與宋氏構想恰恰相反的是，當年中國的棉花獲得豐收，國內原棉本已供過於求，遑論美棉。中國方面只好求諸日本廠商協助購買，但日本政府卻明令規定所有駐華日本紗廠一律禁止購買美棉，按照日本新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的話來說，就是要在「事實上中止」棉麥借款。<sup>50</sup> 致使美棉的銷售更為困難。在這種情形之下，中方不得不要求美方將美棉的債額由4,000萬美元降至1,000萬美元。

關於成立諮詢委員會的建議看來也只是宋子文一廂情願的想法。英、美等西方國家雖然最初對此計劃尚有興趣，然而一旦遇到日本的強烈反對，他們生怕因此而損害本身的利益，因而退縮不前。隨著宋子文的下臺，這個計劃也就立刻煙消雲散了。

相對來說，國聯對中國的技術援助還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宋子文雖然辭去了行政院和財政部的職務，但仍保留著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一職，繼續推動與國聯的合作。1933年10月3日，拉希曼如期抵達南京就任國聯駐華代表，其間拉氏除了幫助全國經濟委員會聘請外國專家擔任顧問之外，還隨時將全國經濟委員會所舉辦的事業報告國聯秘書處。1934年5月，拉希曼於日內瓦出席國聯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的會議時，發表了著名的《拉希曼報告書》，主張加強國聯與中國的技術合作，使中國逐漸富強。此舉立即遭到日本的激烈反對，日本政府公開宣佈，任何對中國的經濟財政援助均不能成

<sup>48</sup> 〈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紀要〉（1934年2月21日），《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濟（一）」，頁89。

<sup>49</sup> 吳景平《宋子文評傳》一書對宋子文辭職的原因分析得極為詳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13-14）。

<sup>50</sup> 日本外務省檔案：〈廣田弘毅致有吉明函〉（1933年10月21日），轉引自入江昭等：《巨大的轉變》，頁85-86。

功，並警告若有國際財政援助，將會增加中國的債務負擔。<sup>51</sup> 雖然當時國聯對日本的態度並未加以理會，但當拉希曼一年任期期滿回國後，國聯即不再續派代表常駐中國，這實際上是屈服於日本的壓力。

宋子文1933年歐美之行事事、處處都受到當時的國際關係特別是遠東局勢的制約。很明顯，宋子文「聯合歐美、抵禦日本」這一設想未能實施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當局粗暴干涉的結果，這也徹底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同時也讓人們清楚地看出英、美等西方國家爲了保護本國的利益屈服於日本壓力的利己立場。儘管宋子文此次出訪未能完全達致預期的目的，但這一行動的本身卻明確地向歐美各國表明中國迫切需要外援的願望。在這之後，中國政府也相應採取一系列措施，譬如自1934年起重新確定整理外債方針、開始全面清理無確實擔保債務以來，債信隨之迅速提高；1935年11月改革幣制，統一發行，改善投資環境，從而減少了吸引外資的障礙；宋子文本人也在致力於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工作同時，根據蒙內的建議，於上海銀行界中發起並創辦了中國建設銀公司，爲吸收外資發揮導向作用。所有這一切努力都產生了相當顯著的效果，終於在抗戰爆發前的一、二年形成了外國對華投資的高潮。

<sup>51</sup> 《申報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34年6月15日)，頁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Effort to Seek Aid from the West: T. V. Soong's 1933 Trip to the U.S.A. and Europe

(A Summary)

Cheng Hwei-shing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pril to August, 1933, T. V. Soong, in his capacity as the Vice Premier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Minister of Finance, paid a four-month visit to the U.S.A.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Outwardly, Soong was represent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ttend the Washington Economic Symposium initiated by President F. Roosevelt and the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convened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London. His real mission, however, was to seek economic aid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from the U.S.A. and European countries to carry out his strategy of "uniting the U.S.A. and Europe to resist Japan."

The major activities of Soong's 1933 trip include: meeting prominent U.S.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figures to sign the Wheat & Cotton Loan; planning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with the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of the U.S.A. and Europe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loans to China;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with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inviting overseas professionals to work in China. Although Soong's trip did not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owing to the Japanese interference and obstruction, it did exhibit China's desire to seek foreign aid. In the meanwhil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ok measures to clear obstacles in absorbing foreign capital, and these efforts brought an upsurg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